

黄氏三兄弟大雷、大威、大刚在百雅轩网上致各界朋友书,通报了黄苗子先生走完他百年人生最后路程的消息,末了说:“只要记住他的幽默、达观和谦和就够了。”我深然之。

一说幽默,不能不想到苗子的“打油诗”。苗子从小习诗,但在读到他的诗集之前,曾见抄传的多是他的题画诗。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往往题诗,或画龙点睛,或借题发挥,或若即若离,久有称人诗书画三绝之说。题画诗并不是与画互为图解,因此琢磨起来便有趣味。拿苗子题林锺《钟馗夜归图》看,画的是钟馗大醉一少妇扶掖之:“小妹相扶抑小妻?晕晕乎乎醉如泥。终南进士司何事?白昼鬼行君夜归。”又如一阙题

《醉钟馗图》的(西江月)下片:“妹子嫁归香港,孩儿走读西洋。妖魔鬼怪任披猖,老子醉乡放荡。”幽默会使人忍俊不禁,但幽默绝不止是为了搞笑。单纯的搞笑是插科打诨,

诗人黄苗子

邵燕祥

苗子不为也。苗子的幽默绵里藏针,让人一笑后不免引起联想。他题丁聪《不倒翁图》的(菩萨蛮)上片:“东西南北团团转,是非黑白何须管?风好护袍红,红袍护好风”,好一个“风好护袍红,红袍护好风”,胜过了曹雪芹替薛姑娘写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若说打油诗是文字游戏,苗子确是把游戏文字玩得炉火纯青了。

如果说苗子“戏为元

公(启功)作”的长歌《保护稀有活人歌》还带着游戏的味道,另一首《长歌行》,则是长歌当哭,缘于舒芜在《读书》杂志发表《让伐木者醒来》,介绍荒芜在北大荒

的《伐木日记》,其时荒芜已郁郁离世,苗子在南半球的布里斯班读了此文,忆及在完达山伐木的日子,一起分配北大荒的友人,有的已经长眠异乡,悲从中来,句句血泪。苗子还写了许多赠友忆旧悼亡的诗,俱见真情。也许正因“所见多矣”,“生幸不死死微尘”,才有后来在生死问题上的通脱、旷达吧。

而从整体来看,苗子打油诗的灵魂,却在他对国运民命的执着,对侵害人民权益的犀利指陈:“大腕发财凭盖印,白条无据却征粮”,“先富尽多无赖子,后门争走富平侯”,活画出当时当地的弊端所在,他深感忧患,苦思求解:“茫茫来日愁如海,改革当真是妙方。”这是他的答案——唯有改革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或问,这样严肃的内容和主题,也叫“打油诗”么?苗子有两句诗为大家所熟知:“春蚓爬成字,黄油打作诗”,前一句是自谦,说写的字如蚯蚓,后一句则他第一本诗集就命名《牛油集》,他的打油诗,是从这个属牛的人精神的骨髓里榨出来的“油”啊!他写给广东老革命、也是老诗人的胡希明的诗中,说“思到无邪合打油”,可见在苗子心目中,打油诗者,乃是区别于任何功利的实用的写作的。

我跟苗子夫妇在什么地方初见,已记不清,因

为没有日记可供查考。总是在“文革”之后,上世纪80年代,“生还”的文化人们缓过一口气来,互相交往不受追查的时候。人们喜欢拿狄更斯《双城记》开卷的一段话形容这个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因为新旧并存,左右交叉。但我发现,我们这个躁动的社会,除了明确的政治分野以外,还有一些你要凭感觉来辨认的生活圈子,比如有些人实际上生活在《官场现形记》里,有些人生活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甚至有些人生活在《金瓶梅词话》里……但也有些老人,仿佛生活在《世说新语》的某些篇章里,当然不是讲谋略的章节,而是讲机智和情趣的,其中就有杨宪益、丁聪、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们,还有许多人,如方成、荒宪、罗孚、高汾高集夫妇、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大抵生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亲身经历战前、抗战和内战,熟悉重庆、成都、桂林、昆明、上海、广州以至香港,然后来到北京,这还不够一部现代“世说新语”的宏大背景么?文化界特别是“国统区”文化界的故实,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听他们谈今说古,见出其“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尤其见出他们超脱一己的遭遇,而关注着整个社会。

我于书法和绘画是完全的外行,对苗子在这方面的成就,包括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唯有瞪目仰视,不能赞一词。于传统诗歌,我也是半瓶醋,一只脚还在门外。但如苗子、宪益他们,已成“风雅”的化身,我就成了“附庸风雅”的人(苗子、郁风、荒芜和陈敬容80年代办《诗书画》,我就成了

多年前看《辛德勒的名单》,尽管二战反法西斯题材影片多如牛毛,还是被深深震撼,那份沉重,那种光芒,多少年过去,还是挥之不去。《金陵十三钗》观后,也是一份沉重,也受到震撼。与辛德勒不同的是,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群被轻贱的青楼女子。她们美丽,一种残酷的美丽,命运残酷,依然美丽,分外美丽,令人心悸的美丽。南京城破,全城变成日寇的大屠宰场,一群女学生和一群青楼女子失魂落魄先后逃入教堂。日寇封锁了教堂,由于教堂内藏有女学生被发现,日寇头目勒令约翰神父(实为殡葬师):十三名女学生去日军司令部参加庆功演出,少一个也不行。日寇每天奸杀的妇女不计其数,慰问演出这个陷阱,女学生不完全懂,青楼女子都心知肚明。

这个生死关口,女学生只知哭哭啼啼,青楼女子玉墨,深思熟虑,提出由自己和姐妹们代替这些孩子去投虎穴。打动她和她们的是一群孩子,玉墨童年就遭受摧残,她从这群孩子身上看到当年的自己,她不忍心让这些孩子去受蹂躏、屠宰。她珍爱自己的生命,她把这群孩子也当作自己了。这是一种令每个有良知的人为之动容的珍爱,玉墨带动姐妹们的这一选择,是绝境中的悬崖一跃,是烟花人生的蜕变,人性中没有泯灭的善良、正义被激发,它的光芒从这间灰暗地窖中喷发!这似乎不可思议(包括年轻女人怎么能像少女一样骗过日本人),同对他人的灾难冷漠、旁观、麻木不仁相比,这自然是高度理想化的处理,理想的光芒是不该在艺术创作中熄灭的。张艺谋和他的团队凭精巧的构思,缜密的细节,功力、激情,出色地令人信服地完成了这个艺术创造。

片中居于关键地位的神父约翰,从一个只知要钱的醉鬼变成收容、搭救这群女子的救星,这似乎也不可思议。作者之一)。去年一次到朝阳医院看望苗子,他兴致很好,谈锋甚健,随手把他题黄永玉《群猴图》的一首七绝抄给我:“子孙来自类猿人,凿凿言之达尔文。太惜(息)西游无续本,天官闹罢闹乾坤。”这是典型的黄苗子打油诗。到了晚年,幽默调侃之间,依然饱含着他对于人类现状和未来的关注。

人们知道在南京大屠杀中挺身而出应对日寇的二十几位外国友人,都是更有资格的人士。跟他们相比,让醉鬼殡葬师跟他们一样成为救星,这个反差太大了。可这就是艺术,非常情况下一个平常的人也可以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不平凡之举,戏剧的张力由此而生。从醉鬼到英雄的转变,有根有据。钟情玉墨是一个因素,要赢得玉墨的心就不能再做醉鬼。但最大程度激发约翰良知的还是那群童稚的孩子。还有侵略者的血腥暴行,他自己也差一点被乱枪打死。他自然也不忍心把这群孩子送进虎口。约翰开始不愿让玉墨们代替这些孩子,玉墨的坚决不二使他改变态度,震撼他的已经不是玉墨美丽的脸蛋,而是美丽的灵魂。当这些群怀揣锋利玻璃碎片的女子(其中有一个是教堂勤杂工冒死男扮女装)在日寇的刺刀下一个一个缓慢地爬上卡车,观众不禁屏住呼吸。这群青楼女子的去向在影片中就此戛然而止。它给我们留下想象空间。殡葬师最后开着卡车带着一群孩子逃离教堂,扶着驾驶盘眼中漾着泪水的画面,也让我们难忘。饰演约翰的贝尔全身心进入角色,表演精准到位,观众接受了他,会永远怀念这些在中国人民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国际友人。

中国表现抗日年代生活的影片,早期停留在《地雷战》《地道战》之类题材上,《血战台儿庄》一出,局面开始改观。中国抗战是全民抗战,正面战场的搏杀尤为惨烈。世界人民熟悉德国法西斯暴行,反法西斯影片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反映抗日战争年代的影片也要用人家听得懂的电影语言走出国门,让世界人民感同身受,中国人民在那场浩劫中的深重苦难,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认识中年山水画家董如青先生,是在两年前《王克文师生山水画展》上。作为王克文的得意弟子之一,如青兄的作品沉重厚实,很有气势。而云壑松烟、林木浓郁、飞瀑流泉、溪桥人家,又画出了江南地区葱茏苍翠、清新典型的景色。不久前,我收到他寄赠的新作《董如青画集》,觉得他在两年里百尺竿头,较前更进了一步。

中国的山水画,一千多年来源流相沿,技法成熟,是后人取之不竭的宝库。三十年来,如青兄一直追随王克文老师,徜徉在这宝库中,尽情地吸收、消化,为我所用。慢慢地,他的目光主要投向了王蒙画风。这当然与王蒙是当代研究王蒙的专家有关,但也与如青个人性格有关。在他看来,王蒙与倪瓒代表元四家中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后者意境清远萧疏、简中寓繁,前者则繁线密点,技法丰富多样。不过,倪瓒是十分推崇王蒙的,有诗:“叔明(王蒙字)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如青说:“我追求的正是像王蒙这样的画风:有深度,有难度,既有时空表现的广袤性,又有形式表现的丰富性,能经得起看,让人越看越有味道。”

这些年来,他反复阅读中国画论画史,刻苦研究各种皴法、技法,尤其是王蒙的皴法技法;又从黄宾虹、张大干等古今名家身上寻求启示,醉心于他们作品中张扬的个性和充满新奇的创造力;更通过师法造化,在大自然中印证技法,努力把传统技法体现在师造化的过程中。所以他的画,往往通过层层叠加的画法 and 层峦叠嶂的布局,使画面更丰富,又有内涵。他的画多从生活中来,在仔细观察自然变化基础上捕捉素材,再采用相应的笔墨色彩予以表现,结合成为恰当的艺术形式。

我们且看画集中的一幅小青绿山水《松声泉韵》。画家运用深远与平远结合的画法,山峦重重,屋舍栋栋,松树密匝,云气环回,一派幽静深邃气象。设色敷彩则滋润鲜活,呈现洁净之美。近景的树干,精勾细描,树叶双钩填青,再加上造型丰富多变而能动感,仿佛能听到松风飒飒。这松声,又与激越而下的飞泉轰鸣声,合成一阙大自然的交响曲,令人陶醉。总之,这是一幅带着坚实的传统基础走进生活,具有现代气息的好作品。

董如青先生,字松声,号如青,浙江嘉兴人。1940年毕业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曾任教于杭州、上海等地。现为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著有《松声泉韵》、《松声泉韵》、《松声泉韵》等书画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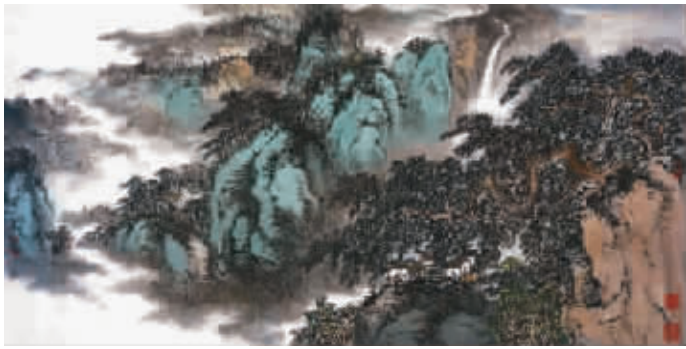
残酷的美丽

史中兴



笔墨精到董如青

吴忠



松声泉韵 (国画) 董如青

从文学青年到文化自觉者

魏心宏



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容易与文学结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沈刚就是这样,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喜欢写点什么,毕业了干脆就直接到了文学杂志社去做了编辑,编稿之余,自己也写点什么,青春啊,迷惘啊,探索啊。与同时代的很多青年一样,沈刚即便是干上了与文学有关的职业后,依然还是无法感受到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可是,他遇到的毕竟不是一个只让人荒废的年代。沈刚从狭窄的文学小圈子里跳出来,走入新的行业,开始了他的广告职业生涯。沈刚为他的公司起的名字叫唐神,这当中还是分明可以感觉到他躁动的内心。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对文学的爱好这个时候却成就了他。八十年代,中国的广告业刚起步,广告无论就制作水平还是创意都显得很简单直白,缺乏感染力。可是,随之而来的大发展的时代,中国在一个瞬间里就赶上了世界,这个世界上所有花里胡哨的广告都来到中国,而对广告还缺乏概念的中国人迎头赶上了世界的潮流。沈刚和他的公司也就在这股潮流中锻炼着学习着,他发现,商品经济时代的文化并非像古玩那般纯粹就是一个摆设,而更多的是一种创造,很多生活的进步其实就体现在一个看法一个新的理解之中。沈刚开始重新整理起自己从年轻时代就养成的对文学的爱好,他惊讶地发现,青春岁月一点也没有白白流失,爱过的,信过的依然都在,只是他需要对那些昔日的爱好做出新的提升和解答。

后来的结果证明沈刚当初对文学的热忱不是毫无价值的,在唐神这家广告公司所创意的广告中有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气韵,尽管它们一时还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心能随着艺术就已经在说明着一切。而沈刚则更是从广告能策动人心这点上,更多地发现了文化媒介与传播与感动人之间的关系,他愈发地热爱起这份事业了。

一个人从年轻时代一个悄悄的喜好出发,走到能将这种喜好做成能为更广大的社会和民众服务的事业,沈刚以自己的人生去体现到了一个现代社会对文化对文学的需求,他依然要感谢的还是文学。请读沈刚的新书《别了十八岁》。

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我的男朋友住在闵行路东新康里,我们是1956年结婚的,住的房子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阁楼上。这幢房子原来是日本人开酒吧的,进门很低,当中高一点。听说以前东新康里都是日本人蹲的地方。我搬过来的时候,当时弄堂里都挤满了。住的基本上都是小老板,他们的店铺当时开在闵行路和塘沽路,闵行路一直到长治路,开的都是小金店;塘沽路到峨嵋路,开的都是裁缝店、糖果店、洗衣店和饭店,其中德大饭店有点名气。

住在东新康里的独幢头房子比较多,我记得31号是独幢头的,39号也是独幢头,康家姆妈屋里也是独幢头。另一家独幢头,因为是做牛肉生意的

晒台、天井都可以晾晒牛肉。不过弄堂里也有一些石库门房子,住四户人家,楼上两户,楼下两户。他们为了楼道和灶披间的公用地方堆放杂物等琐碎事,经常会吵得面红耳赤。其中有一家住二楼的,在人家底楼的天棚上搭了个灶披间,每天污水滴滴答答漏下去,于是两家人天天吵。我当时是里弄小组长,经常夜晚去处理这些纠纷,说得来是口干舌燥。回到家里,一口气两大杯白开水,还不解渴。

弄堂里地势低,一到夏天雷雨季节积水大,水没到了膝盖,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水腥味道。我就发动大家,一起用篾竹片捅阴沟洞,让积水慢慢地泄下去。

因为我们弄堂人太多,当时

塘沽路的人较少,我们都到虹口一中心小学门口,铺席子乘风凉,有的辰光还到长治路上。碰到最热的一天,都是到晚上睡到早上。我记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有个小姐妹叫李小平,有一次我们两个人睡在弄堂居民食堂旁边,早上爬起来,李小平满脸黑擦擦的,全是烟灰,面孔比公还黑。乍一看,人家都吓了一跳。原来食堂早上生炉子,烟囱里冒出来的灰,一古脑儿地落到了她的脸上。

弄堂里从早到晚,都有叫卖声。老人都喜欢买檀香橄榄,逢年过节,有亲戚朋友串门,就用檀香橄榄泡茶,取一个讨口彩的吉利名头,叫“元宝茶”。

靠峨嵋路的弄堂口,有一家

姓张的,人家叫他白癞痢,开了一家老虎灶,现在转给外地来的小山东卖蔬菜了。老虎灶旁边还有一家白铅皮铺,我们的铅桶、钢精锅子、水壶什么的坏了,都拿到铅皮匠这儿去修,现在铅皮铺早就没有了。当年弄堂口还有一个公用电话亭,老早底一般人的条件都不好,每户人家都没有电话。电话都是打到公用电话间,然后由管电话的阿姨去叫人。小时候没有什么东西玩,女小囡踢毽子、跳绳子;男小囡打弹子、钉橄榄核子。

现在弄堂里老住户少了,都在外面买新房,老房子就借给别人住了。(葛建平 刘莹 整理)

十日谈

石库门生活口述

明起刊登
一组《我的
年终奖》,责任编辑:
徐婉青。